

戰國文學*

饒宗頤

- 一、戰國文學的地域性
- 二、取自民間的新體制
- 三、韻文中詩、騷、賦、頌的相互關係
- 四、散文中諸子書相當於後代的「集」
- 五、金、石刻辭二者的消長
- 六、游說文學的興起及小說的濫觴
- 七、戰國文學觀念的演變

戰國 (BC 403-221) 是諸侯力征的時代，「不統于王，分爲七國。」每個國家都各自尋求它的發展的道路。因之，「律令異法，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序）文學方面，亦各有獨特和卓越的表現，像諸子的散文和楚土的韻文，都開放着燦爛的奇葩。章學誠云：「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文之體備。」（詩教上）可見戰國時代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本篇探索範圍，一般文獻以外，考古學的新資料，亦附帶一併討論，用以開拓文學的領域，並補直向來文學史家所未注意的部分。

（一）戰國文學的地域性

一般文學史家談及先秦文學時，都很喜歡劃分爲南北文學，以詩經和楚辭作爲代表，這是非常膚泛的。呂覽音初篇已分別東、西、南、北四方的音，各有它的來源。到了戰國時候，由于把春秋散漫而割裂的局面，搏聚爲幾個大國，處于中原的三晉算是三位一體，名爲七國，其實不外五個重要單位，即秦、晉、齊、楚、燕。這裏分爲幾個單位，加以敘述：

* 本文爲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五本之一章。 審閱人：陳槃先生。

周

周地的歌詩在藝文志詩賦略中所記錄的，有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周歌詩二篇，總共一百七十篇，有聲曲折的共八十二篇。周地到了戰國，成為商業的重鎮，像呂不韋以陽翟大賈往來販賣于邯鄲。我們看六朝的吳歌、西曲，即流行于江南及荊州商業區域的估客，沈溺于聲色玩好，飲宴取樂的作品。周地歌詩的發達，當然和商業城市的發展，有密切關係¹。至於聲曲折就占了八十二篇，又可推知當時已如何注重音樂歌唱的部分，可惜這些作品都沒有流傳下來。

燕、秦

在北方，北音的起源甚早。呂覽音初篇：「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于飛，實始作為北音。」可以追溯到商頌的「天命玄鳥」及邶風的「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漢書詩賦略有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其後魏文帝有燕歌行。庾信云：「燕歌遠別，悲不自勝。」由于荆軻有易水寒之句，後來王褒因之，作燕歌描寫塞北苦寒，梁元帝及諸文士和之，競為淒切。燕、趙之音，向來是以悲歌慷慨聞名的²。

秦居關中，席岐周的舊疆，充分接受周文化。文字是繼承西周的系統，所以獵碣（石鼓）上的繁體，即沿襲史籀的遺制。石鼓文是十首一組的聯章詩，車攻馬同語句，分明是三百篇的摹仿者。史記說：「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記事。」又說：「時有史敦，為秦國史官。」（封禪書）遂有「秦紀」，一書³司馬遷采入于六國表。晉侍中彭權嘗見過其書（御覽680引摯虞決疑要畧）。呂氏春秋音初篇說：「殷整甲徙宅西河，始作西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整甲是卜辭中的戔甲，為西音的創始者，而秦風即西音之步武者。秦風黃鳥篇哀子車氏三子殉葬，成為後來漢、魏詩的主題（像曹植的三良）。秦風十篇中，車鄰是美秦仲，駟鐵四篇為襄公作（依據詩序），可是沒有穆公時的詩。崤之敗，穆公悔過，作秦誓（見左傳僖三十三年及書序），後來列于尚書。至惠文王，又有詛楚文⁴，告于大神巫咸，以咒楚王熊相（槐）之背盟。宋章樵收入古文苑，其行文則髣髴春秋晉國的呂相絕秦，十分動人。姚寬西溪叢語上記詛楚文，又論秦誓文有三本。詛楚文中的嗣王，向來認為是惠文王。唐蘭以為惠文即位

時不稱王，定其年代為 B. C. 310年⁵。

秦統一天下後的詩賦，可考的大約有下列各篇：

①博士僊真人詩——「秦始皇三十六年，令博士撰。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史記始皇紀）。」疑是遠遊一類之神仙家言，或出於燕齊方士之手。

②長城民歌——楊泉物理論：「始皇起驪山之衆，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水經河水注引）語亦見建安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這可說是很早的五言詩。

③黃公作歌詩——漢志名家：「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④秦時雜賦九篇——文心詮賦：「秦世不文，頗有雜賦。」

從秦國文章著述上來說，呂氏春秋一書應該為代表統一前秦的文學作品的總匯。其書寫成于秦（始皇）八年涇灘之歲⁶。此書之作，乃不韋使其賓客，人著所聞，輯集而成。似其賓客借此書以收攬衆譽，收買天下之人心，儼然以一家春秋，托為新王之法。在他眼中分明沒有始皇，而不韋與秦廷之間，諸多矛盾，于此可見。

楚

楚國地區有它獨特的語言。揚雄方言中所列舉的楚郢、南楚、江湖之間的特殊事物名稱的方語，像「佗儗」、「貪憊」等聯綿字，是用地方音表達的語彙。有人從楚辭中輯出屈、宋方言⁷，同時楚人歌唱，又有它的獨特作風，謂之「楚聲」⁸。「楚聲」到了漢初仍然流行於淮河流域等地帶。

在屈子前二百年，楚康王母弟鄂君子皙泛舟，越人擁楫而歌，越譯而楚說之。楚譯是：「今夕何夕兮……？」而原文則是：「濫兮杓草濫……。」原文用古越方言，依音讀錄出，有如西漢四字句的白狼歌⁹，可惜原文無從復原，亦無法加以句讀，不知是否一字一音，抑一字多音，末由擬測。可是楚譯的詞句，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句法，與九歌之「沅有芭兮澧有蘭」相同，漢武秋風辭的「蘭有秀兮菊有芳」亦本之。有人說楚譯文詞見於說苑善說篇中莊辛的談話¹⁰。莊辛事，楚策謂其說楚襄王，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上蔡、陳之地。則辛乃頃襄王時人，在屈原之後。如果說這些楚譯的越人歌出於莊辛，很可能譯出寫下來的時候，沒有那麼早，而實在反受屈

原賦的影響呢！

此外尚有幾首用楚音而較古的歌，詞句古簡，其中都有「兮」字，這些應該是騷辭的先導¹¹：

①楚狂接輿歌——見論語微子篇及莊子人間世。

②漢上孺子歌——見孟子離婁。

③徐人歌——見新序節士：「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④吳伍胥蘆之漪歌——「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又漁父歌：

「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將奈何！」

此歌見吳越春秋，不見於史記伍子胥傳。這些歌辭分明是「楚聲」，和漢初虞兮、三侯之章有類似之處。試看吳歌的特點，到東漢時梁鴻適越作五噫之歌，仍保持著重用語助，慨嘆詠言的調兒。這首歌寫成的年代，無法斷定，但分明是屬於「楚聲」系統。吳越地區後來都併入楚的疆土之內，所以吳、越古歌亦是「楚聲」形成的重要成份。吳、越及接輿、滄浪四歌皆用「兮」字，并是「楚聲」。呂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是「兮」字用法，通行于南音系統¹²。

楚地人文蔚盛。以著作論，老子道德經保存許多古代的格言；莊子、荀子都是楚人，一以寓言、卮言構成他的汪洋恣肆的文體，一以縝密的說理文勝，特別發展賦體，皆是千古妙絕的文字。（荀子不苟篇引：「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己之漁漁，受人之域域者哉！」則襲用楚辭漁父，此荀卿之賦出自楚辭之證。）另一系統爲天學的闡發及懷疑精神的發揚。唐昧以降，而畸人黃繚對惠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莊子天下篇）。到了屈原遂有天問文體的創作。在銅器銘文像鄂君啓節爲絕佳的交通地理紀事文¹³，緡書以四字爲句，構成韻語，這二篇都是楚辭以外可以諷誦的特出楚國文章。

齊

齊國在威王時喜文學游說之士，其時以稷下爲中心¹⁴。（劉向別錄：「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新序云：「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稷下之徒咸作書刺世。（劉向荀子目錄）韓非外儲：「兒說，宋人善

者也。指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稷下先生自淳于髡、田駢、荀況、鄒衍等爲諸子的巨擘，故稷下的學風，實爲先秦學術人物的淵藪。（稷下見水經注淄水注引鄭志張逸問書贊作棘下。）齊一地在先秦文學上的重要性，尤其在散文著作方面，成就及影響更大。管子一書，爲齊地文學著作的總匯。晏子春秋中有歌：「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景公爲長庚章）其他歌詩斷句如：

田成子 榮芭歌 （見史記田完世家）

馮諼 彈鋏歌

齊人 松柏歌 （俱見齊策）

齊聲舒緩，和燕、秦慷慨的高腔，在聲曲折上表現亦有懸殊¹⁵。

趙

法家興于中原，商鞅出于衛，鄧析、申不害產于鄭，吳起、李悝、尸佼起自魏，韓非、韓諸公子；慎到、荀卿產于趙，李斯籍楚（上蔡），皆中土之人也。法家傳播所及的區域，諸子游仕之地，以秦爲主，而韓、魏次之。申不害相韓，商鞅先仕魏，後相秦。法家深抑文學，故中州文風，不及齊楚，文章亦樸質無華。

三晉在戰國時代，詩歌寥寥可數，趙有琴歌，（辭云：「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見趙世家及列女傳）又有號笑之謠（趙世家），魏有文侯之誦（呂覽期賢篇），鄴氏之歌（漢書溝洫志引。詠史起事云：「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得水兮灌鄴芳。終古烏鹵兮生稻梁。」）餘則無聞¹⁶。

文心時序篇云：「春秋之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颯駭。……惟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路，楚第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劉氏指出齊、楚二地在文學上的重要地位。可知齊楚二國，當日除政治有其特殊政蹟外，於文學亦有較深厚的文化憑藉，故成就特高。

（二）取自民間的新體製

新的文體起於民間，到了文人手裏，加以取材而變化之，踵事增華，便成爲新的

製作。在戰國時出現的新體製，舉其可研究者，有下列各種：

I. 成相

「相」本是樂器的拊，用以節樂。禮記樂記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鄭注：相卽拊也。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拊，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劉熙釋名：「搏、拊也。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亦見尚書益稷鄭注）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則在廟堂上奏樂時，亦擊拊（相）以合歌聲之節奏。雅亦是樂器。鄭注：「狀如漆笛，中有椎。」是用椎擊笛發出聲音，用以節舞，卽是所謂舂檠。

古代歌與舞往往聯合舉行，以相來調節歌，以雅來調節舞。原來單純唱歌，一面擊着糠鼓來伴奏就叫做「相」。到了後來，凡利用一定節奏來調節歌聲緩急的，都可叫做「相」。

禮記檀弓：「鄰有喪，舂不相。」鄭注：「相謂以音聲相勸。」朱熹云：「相者、助也。成相、助力之歌也。」（楚辭後語又方以智通雅卷三）史所謂五穀大夫死而舂不相杵是已。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劉晝新論：「牽石挖舟，必歌嘯喚。」故「相」亦爲勸力呻吟的送杵聲。所謂「請成相」，亦猶「請奏相」，有如打大鼓時的開場白，「請打打鼓，來唱一曲」一樣。成相辭，該是後世彈辭及鼓兒詞，以及唱道情一類之祖。（盧文弨卽認相爲彈詞所自出。）¹⁷

漢書藝文志著錄成相雜辭十二篇，在漢人雜賦之末，惜已失傳。今可見的，只有荀子的成相篇。和佚周書周祝解體相似。成相篇的內容，有點像後代的勸世文。成相篇很少人做其文體，摹倣它類似史詩的有元人的作品，保存在永樂大典中。

II. 招魂

「招魂」原是民間的一種習俗，東南亞及蒙古民族都盛行之。六朝人對招魂的看法是這樣的：陳沈炯歸魂賦序云：「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全陳文14）人的靈魂通過巫師可以呼喚和收攝。收魂的儀式至今許多地方流行着，由道士主持。明鄭露亦雅有「收魂」一條，記巫者瑤貍持籃以收魂。從沈炯文看來，此俗的由來甚早。

劉勰又有另一說法云：「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麗也。」證以招魂中有一

「工祝招君」，及「巫陽焉乃下招曰」等語，可見古代招魂的手續，必有「祝辭」。（莊子天運篇亦云：「巫咸招¹⁸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天下載之，此謂上皇。』」此招字借爲招。）巫陽、巫咸都有招和招的事¹⁹，「招魂」一類的文字，原應是巫者的祝辭。屈、宋依倣之，把原有招魂所用的祝辭，加以增飾而別鑄偉篇，遂有招魂、大招一類的佳構。

蜀東風俗，以病者爲山鬼作祟，必延巫驅厲鬼以招魂。招魂有小招大招之分，小招俗謂之送星宿，有迎鬼、安魂、送鬼三步。安魂用薰籠，並取玄色線繩繫於病者之身。送鬼則用五色線、五色布，送時呼病者名氏，招其魂來歸。說者取此習俗以解釋楚辭招魂：「箝縷綿絡，永嘯呼些」二句。蜀東招魂，羣巫皆有一套泛用巫辭，如云：「婦人之鬼，奶子丁當；產後之鬼，血汨淋瀝；病夫之鬼，咳咳嗽嗽；叫化之鬼，棍棍棒棒；災兵之鬼，刀刀槍槍。」又魯東招魂：「蕩蕩遊魂，何處留存？或在廟宇，或在山林；天神地神，門神竈君，招魂還家，復起精神。」其文詞皆鏗鏘動人，可知楚辭招魂之辭，可能原爲戰國楚地流傳招魂的巫辭，經宋玉輩潤色成篇²⁰。

我到過蘇門答刺的 Battaks 山，據說其土人招魂的詞句是這樣的：「魂啊！回來吧！」這和楚辭的「魂兮歸來，返故居些！」恰好一樣²¹。古禮，死時招魂之辭曰「復」。禮記曲禮：「復曰天子復矣。」鄭注：「始死時呼魄辭也。」檀弓：「復，盡愛之道也。」鄭注：「復謂招魂。」又禮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復」卽是「歸來」之意。「復」爲古禮，自天子諸侯以下至民間皆行之。喪服小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復」的制度，詳見喪大記：「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朱子以爲中原對死人招魂，荆楚施于生人。今廣東東莞縣風俗，凡兒童因受驚成疾，可請老嫗以剪刀及尺擲地膜拜，招回驚散的魂魄。可見這種風俗流行地區的廣泛。

招魂和大招二篇所用的語助詞，一個用「些」，一個用「只」；「些」字後來尙流行著。宋柳拱辰永州風土記云：「競船舉棹，則有些聲。」可以見之。

楚辭中的招魂、大招，作者爲誰，所招究爲何人的魂，說者紛紜，今且不論。但這二篇必是根據楚俗民間巫者招魂手續所用的祝辭，在詞藻上，加以組織夸飾，是可

斷言的。作者不論是屈抑是宋，他們是取資民間作品，加以改編，踵事增華，作成新製。

大招只向四方招魂，招魂則四方之外，兼及上天下地；「幽都」一段，對地獄有具體的描寫。長沙馬王堆軾侯墓所出銘旌的繪畫，帷幕上挂着穀璧玉璜，正是招魂篇「挂曲璜些，結璚璜些」的寫照。是圖之出土，對於楚俗招魂制度的了解，有很大的幫助²²。

III. 挽歌

唐李匡父資暇集：「昔謂挽歌始自田橫門人，非也。左傳（哀十一年）魯哀公會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也。如是則已有久矣。」史記周勃世家記他「爲人吹簫給喪事。」索隱謂「左傳虞殯若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也。」御覽 552 引莊子佚文云：「緇謳所生，必於斥若。」司馬彪注：「緇，引樞索也；謳，挽歌也。」是挽歌出于緇謳。莊子大宗師記子桑戶死，或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這當是挽歌之一例²³。本是挽柩者所唱的。（崔豹古今註）

可見挽歌在先秦已有之，後來的相和曲才演變成薤露、蒿里一類。故鄭樵通志樂略稱：薤露歌亦曰天地喪歌，亦曰挽柩歌。到了漢以後，賓婚嘉會，酒酣之後，繼以挽歌（應劭風俗通）。六朝時，挽歌成爲娛賓的節目；文人亦學作挽歌，魏繆襲、晉陶潛所作，均爲人所傳誦。

上舉即是文學作品吸收民間文學形式，加以改進的成相、招魂二個顯著例子，一於齊，一生於楚。至於九歌之製，乃因南郢沅湘之舊曲。王逸稱屈原「竄伏其域，懷憂苦毒，出見俗人祭祀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楚辭章句）劉禹錫亦謂：「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爲作九歌。」（劉夢得文集九）彼之竹枝，亦取自建平民間之作，是說衆所熟知，故不詳論。

（三） 韻文中詩、騷與賦、頌的相互關係

班固云：「賦者、古詩之流也。」詩的諷諭作用，後來轉移到「賦」上面去。「賦」初時只是詩的作法，「賦詩」之外，又有所謂「賦辭」。

說苑卷六記舟之僑事云：「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

『君子爲賦，小子請陳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這是陳辭稱爲「賦」的例子。

楚人把辭賦的境域大加開拓，其實是繼承詩教而發皇光大。試看楚辭中的句子，每每稱引及「詩」，舉例如下：

「展詩兮會舞」（九歌東君）洪注云：「展詩猶陳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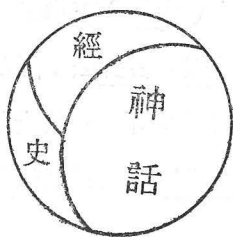
「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大招）王逸云：「詩賦指雅樂。」

在屈宋的作品，有時亦暗中引用詩經。哀郢云：「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即本詩邠風九戩：「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九辯云：「竊慕詩人之遺風，願託志乎素飧。」即取自魏風伐檀。可見屈賦的作者，怎樣熟讀詩，如何吸收詩經句子作爲詞彙²⁴。

劉勰詮賦篇舉「鄭莊之賦大隧，士蔣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長也）；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此明指騷卽是賦。賦自詩出，後來遂成分歧異派。

賦之成立，「以荀卿爲正體。」（玉闥運王志）荀卿賦篇，乃詠物之作，其內容計：禮、知、雲、蠶、箴五者，句法大體爲四字，雜以占曰、王曰等之疑問疊句。或爲君臣問答。（如禮賦：「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與？」）有如卜居句式。賦末間有小歌曰，則如九章，可見體式本於楚辭。而末繫以僇詩，謂之僇者，莊子齊物論云：「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可相當法語之 bizarre）僇與僇同，說文：「僇、變也。」僇詩猶言變詩，取義於「反辭」，乃論其反面，以「螭龍爲螭，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仍是九章涉江的遺意，而下開賈誼弔屈原文。其言「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亦卽天道周星，物極必反之義。僇詩爲賦之末章，仍舊稱之曰詩，足見賦正是詩之流亞。荀卿賦首列禮、知，其辭爲「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和「百姓待之而後寧，天下待之而後平……。」還是本於諷諭²⁵，但已給以篇題，故不是詩而是賦了。劉勰謂：「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爲大國。」（詮賦）其說良然。

騷以諷為主，劉勰云：「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文心明詩）郝懿行云：「漢志以騷爲賦，此篇以騷爲詩。蓋離騷含詩人之性情，具賦家之體貌也。」王逸亦說：「屈原被譖，憂幽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楚辭章句序）都指出騷和詩內在的關係。然騷以夸飾爲其寫作手段，即向來被譏爲詭異、譎怪的部分，這是以神話爲基礎的。漢六朝以來，人們很喜歡討論離騷和經典違合的問題，其實騷不但有些地方「依經立義」，還有很多是根據歷史資料，所以嚴格來說，騷內容成分的組成，應如下圖：



劉勰論諸子文學曾指出有純粹、及踳駁二種。他所說的踳駁者即是神怪之類、怪譎之談，而班固譏屈賦「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劉勰爲調停之說，亦稱屈賦中之「託雲龍、說迂怪」，其詭異之辭，譎怪之事，異乎經典。彼所目爲夸誕，亦即神話部分。在舊觀念中，以經術作爲文學衡量的尺度，凡神話皆以夸誕目之。不知文學中最富有想像力而能够鑄造偉詞的，無如神話；離騷所以能爲一時鬱起的奇文，全靠它和神話結合起來，才有這種成就。孟堅、彥和的說法，在今日看來是很不公允的。

後人把騷作爲楚辭的大共名，連招魂亦被稱作離騷。（水經鮑丘水注引離騷峨峨之詠，即出招魂「層冰峨峨」之語。）夸飾部分的發展，遂爲騷賦中「麗」的主要條件。後來曹丕乾脆地說：「詩賦欲麗。」（典論論文）揚雄區別麗則爲詩，麗淫爲賦，「淫」便是夸飾達到極點的表現。

陸機文賦云：「賦體物而瀏亮。」謂託體于物而貴清明，其文爛焉，要本隱以之顯。（說本王志論詩文體式）王氏謂：「賦者詩之一體，即今之謎也。亦隱語而使人自悟，故以諷諫。」按荀子之賦篇，正是謎語，由隱而之顯，乃賦的特色。

頌是詩之一體，而劉向云：「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藝文志作「不歌而誦」。屈賦中有頌，所謂「三閭橘頌，情采芳芬，比類寓意，覃及細物。」（頌讚篇）有的

賦像頌，（王褒的洞簫賦，亦稱洞簫頌。）有的頌似賦。（劉勰云：「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故言：「頌惟典懿，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那些不太華侈的賦，如荀卿的賦，竟反而近于頌了。

後來，頌成為獨立的文體。詩、騷、賦三者，本來是應該分開的。漢人在目錄書歸入詩賦略，以騷包入賦中，但劉勰却分撰明詩、辨騷、詮賦各篇加以釐別，具體而微，他的見解，是很正確的。

（四）散文中諸子書相當於後代的「集」

漢後若干新文體的興起，據說都從戰國諸子的作品中，分化而出。章學誠詩教上云：『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從章氏說，可見文體源流的大概。諸子的書，以一人一派的著述集為一子，和後代集部的性質並沒有什麼不同。其實，某子即某家某派的文集，這時雖然文集的名稱未立，而文集的性質已具備了。章學誠謂「辭章實備于戰國」，後來只是「承其流而變其體製」而已。又謂「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如「春秋之時，管子嘗有其書」，其後「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輟緝，而非管仲所著述也。」因為「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詩教上）照這樣說來，諸子之書，大抵是某一學派的學者所輯述，亦可說是這一派作者文辭的總集，不必是某一人所著的。（參羅根澤：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²⁶

梁時，阮孝緒在七錄中開始稱四部的集類著作為「文集錄」。其時始有集部之稱（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把個人文章纂在一起，稱之曰集。漢末記載已見之，楊修荀爽述贊云：「載而集之，獨說十萬餘言。」（藝文類聚47）曹丕與吳質書說：「頃撰其遺文（指徐、陳、應、劉），都為一集。」而曹植序亦云：『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類聚55引）可見「集」的名稱，起源甚早。

戰國至秦，逐漸趨於統一，思想界與著述的路向，亦從「小」綜合而趨於「大」綜合。其實一部子書，即是每一系思想圈子的小綜合，它即是某一派的雜家。老子書是古格言的集錄（如其中有古黃帝之言）。莊子是古代重言，卮言，寓言的結合和批判，

其中有齊諧，有楊朱，有田駢等家說。這是一派系初步的結集。至於呂覽又是一個更高的綜合，網羅彌廣，各派兼收并蓄，成為大雜匯式的總集，所以被稱為雜家，這是第二步的結集。其實說某人的集，即是某人作品的纂錄，這和先秦諸子的著作，以某一領導人，或某一派的代表為主而稱為某子，本質上沒有二致，所以六朝以來的集，可說是先秦的「子」的變相。

散文中諸子文的成就是多姿多采的。文心雕龍諸子篇云：「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蠡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翺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又云：「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緯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大略也。」又才略篇云：「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而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上面三段，對「諸子文學」算是作一個概括的論述。

諸子的文章，大抵有兩大系統

A. 尚質者以道術取勝，如墨家的質樸，法家的密察，儒家的清顯。

B. 尚采者以駢辭振奇，如縱橫家的陳辭夸誕，道家的卮言曼衍。

但他們的作品，也有共同的地方：1. 比喻方面，表現文章的形象性；2. 辨證方面，表現文章的邏輯性。這二項都有超越前人的成果，而為後代開無限法門的。

諸子的散文，在五光十色的思想奇葩的種子孕育之下，形成一個璀璨的文園。口語的多量吸收，修辭術的充分運用，透關的說理分析力，廣泛而有機地採用設喻，使這些散文奠定了日後的基礎，對唐宋的散文家沾溉無窮。

戰國以來，文體在語法上之演變與運用，對於散文之形成有極重要的幫助，略揭數事：

①主詞的重複使用，與疊句之構成：

楊樹達曾比較叔夷鐘喜用複詞與呂相絕秦相同（見積微居金文說）。今以詛楚文

與呂相絕秦比較，注重其用主詞的「我」：

詛楚文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寔）繆力同心，兩邦以壹，紕以昏媾，衿以齋盟。欲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蚺……取徯邊城新郢及郢長敕，徯不敢曰可。（容庚古石刻零拾）

呂相絕秦書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殄滅我黃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

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前文反覆用「我」字，故詞氣縱橫，讀起來十分動聽。

②疊字形容詞及駢詞四字格：

如孟子書中之綽綽然、巍巍然、膠膠、蹢蹢、涼涼；莊子之栩栩然、蓬蓬然、恢恢乎；荀子之「快快而亡」、「察察而殘」（榮辱篇）等即是。有時加指示詞於前，如齊物論「之蓼蓼」、「之調調」、「之刁刁」（參徐德庵莊子內篇連語文示例）²⁷。有時還用聯縣駢字四字格的，如莊子的「塵垢粃糠」、「恢恠譎怪」、「惴慄恂懼」；荀子的「勃亂提慢」、「怠慢僇奔」、「愚款端慝」、「庸衆駑散」一類的句子，這對文句的鋪張和夸飾方面，以助長文章的氣勢，很是重要的。

③複合「謂義動詞」之多量使用：

如荀子不苟篇「此之謂也」、致士篇「夫是之謂」。此類複用「謂義動詞」，用以申說解述；對於論說文很有裨益。法家文章精悍廉勁，像韓非說難一文，以「說之難」為主題，而重複為說，計兩用「凡說之難」句，一用「凡說之務」句，以為冒起，而連用三句「非……之難」以承接之。下文分析為言，則連用「如此者身危」，「則身危」等句，反覆致意，迭用助詞之「者」、「則」以貫串之，而於頓筆，言「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此說之成也」，皆用「謂義動詞」收束，委曲周至，所以為千古至文。

前人論戰國文章的作法，如說莊子用跳過法，離騷用回抱法，國策用獨闢法（見劉熙載文概），可見各自有他的手法，所以有獨特的成就，會心在人，上舉只是略示

其例罷了。

(五) 金、石刻辭二者的消長

墨子天志云：「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又見明鬼篇）詛楚文云：「著之石章。」盤盂的性質，必有點像彝器款識的綴錄。盤盂在漢志「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王應麟引七略云：「孔甲者，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于鼎，名曰銘。」史記田蚡傳：「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由此知當時已有彝銘的撰集一類的著述。戰國以來，石刻文學逐漸盛行，金刻反而衰微了。

石刻的發展，與秦地文化似乎很有密切的關係。管子稱：「封於泰山七十有二家。」其銘刻今不可見。降而下之，商時有磬上刻永叔、永余、天余等銘字，這是刻于樂器上的。現在所知戰國刻石，以秦地區最爲盛行，計有石鼓及詛楚文和秦始皇時的嶧山、泰山、瑯琊、芝罘、碣石等刻石。秦本紀記紂時，秦之先世蜚廉爲壇霍太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索隱：「處父、蜚廉別號。」），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垂氏。」而秦蜀守李冰立碑有「深陶潭，淺包陽」句。（張澍蜀典引金石文）秦昭襄王與巴刻石爲盟（華陽國志一），可惜這些石刻已是失傳，但由於秦地石刻的豐富，可見刻石的風氣是秦人加以發展的。

秦始皇在泰山、瑯琊頌功德的刻石，有三句一韻的，又有二句一韻的，爲後世碑銘之祖。（秦刻石用韻見蛾術編五七）劉勰稱：「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文心封禪篇）可見刻石文學，是秦文化中一種重要表現，有它的很長遠之淵源的。

一方面石刻的發展，相反地便是金刻的衰落及銘辭之型式化與套語化。若干政制上習用的文詞，像「顯揚式」的銘和「教條式」的箴，「告誡式」的盟，都是充滿「套語」，已毫無文學的意味。

銅器到了戰國時期，表現下列等現象：1. 兵器的高度發展；2. 花紋之簡單化；3. 以刻畫代替「綴范法」。處處表現著典禮上銅器製作的沒落，故銘辭亦淪於次要的地位。茲以秦器爲例而討論之。鑄於秦景公時（春秋後期 B.C. 576）的秦公簋，是每字用一范，用以鑄款；再合多范而成文，很像後來的活字²⁸。這種綴范法，盛行於春

秋時，可是戰國以來的秦器都是刻銘；其他國家的器物，有的用璽印來印銘，其法不見於秦國²⁹。孝公以後，見於容量器及兵器的文字，表現得非常程式化。由於鑲刻之故，書法變為纖細剛勁，筆畫略呈簡化。這種秦式文字，開小篆的先河，成為官書的楷則，大抵有若干特徵：1. 銘文附記地名（如鉞銘記「雍」，升銘記「重泉」之類）
2. 記明督造者的官銜。試舉出一些秦器物銘文如下：

- B. C. 346 商鞅鉞 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睢(離)_終
(吉圖下50；衡齋下3)
- 344 商鞅升 十八年齊起(達)卿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五分尊一爲升。重泉。(小校11/19；周存 6/124；兩錄 291/292)
此似秦孝公十八年會諸侯于逢澤時器。
- 352-338 商鞅戟 大良造鞅之造戟。(三代 20/21 上下；貞松 12/6)
大字，分兩面鑄，體近小篆。
- 334-321 穆旃戈 四年相邦穆旃之造。櫟陽工上造翳井吾。(雙吉圖下31；三代20、26下)
- 325-312 張儀戈 十三年相邦義(儀)之造。咸陽工市田工大人耆工贊(頽?)。
(錄遺 584；1962/2 文物有陳邦懷釋。)
- 289 上郡武庫戈 十八年，漆工里縱口隶臣賁，工正，上郡武庫。(出土于易縣，銘見李學勤戰國題銘。)
- 286 魏冉戈 廿一年，相邦冉之造。離工市鞞(葉)。(貞松吉金圖下32；三代20、23。)
- 243或244 上郡守越戈 廿五年上郡守□()造，高奴工市窋，工鬼薪釁(正)。
上郡武庫，冶都。(金文叢考 p. 418。)
- 243 相邦呂戈 四年，相邦呂[工]寺工龍承(丞)。(1957年七月，出土長沙左家塘；1959/9 文物張中一文。)
- 342 呂不韋戈 五年，相邦呂不韋造，詔吏圖，丞載，工寅，詔吏屬

邦。(善齋古兵上35；周存；小校 10/59；六書疏證29 p. 49。)

236-210 丞相觸戈 □□年(秦昭十五、六)，丞相觸造，咸□□(陽)市葉工(面)；武(背)(貞續下22；參1964/2文物陳邦懷說。史記穰侯傳有「壽燭」。)。

商鞅有關的器物，有孝公十六年大良造鞅造之鐵(雙劍圖錄下50)，十八年齊率卿大夫衆來聘于重泉鑄造之升(國學季刊 5 卷 4 期 PL.1)及造戟(三代 20. 21. 1)。自是以後，各國似乎推行這種制度，「物勒工名」，成爲一時風氣。秦器冶鑄兵器的地方，以上郡爲最重要，所以可見到的秦器，以上郡守戈爲最夥。有名的秦昭王時鑄的銘文如下：「卅年上郡守越，圖工市(師)精丞秦隶臣庾。」這便是一個例子。

秦國在政治上於戰國末期成爲舉足重輕的國家，奠定大一統的局面。它的文學活動，應該特別受到重視；所以這裏把它作爲金石消長形態下的重要角色。秦文尙質；既并天下，而改命曰制。文心奏啓篇云：「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于篇章矣。」秦的文學，在程式文及石刻文上，都帶點法家的氣味。像泰山刻石，論者謂其「一變爲樸渾，知體要也」。蓋仍以實用爲鵠的，但這一類勒銘，却開了後來文體上的新局。

(六) 游說文學之興起及小說之濫觴

先談游說文學的技巧。縱橫家所用的慣技，有下列各種：

I. 讒語

戰國時的君主，若齊宣王、楚莊王都好隱語。在當時讒語的使用，成爲一種風氣。

劉勰諸讒篇：「意生于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新序雜事：「齊宣王發隱書讀之。」文心又云：「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賦末。」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虛思之，可以無不諫。」漢世輯錄的隱書，今已無傳，但左、國、韓非、呂覽、新序、

列女傳、說苑所錄，像秦客爲廋辭于朝，（晉語五韋昭注：「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于朝也。」），成公賈對楚王以有鳥不言爲諫（呂覽重言）即淳于髡之說大鳥（史記滑稽列傳），靖郭君客之言海大魚（齊策），都是很有名的譎語。桂馥札樸訓隱爲占。隱語在外交上的運用，施之諷諫，成爲滑稽家的拿手好戲。它的流衍變爲謎語，時和小說合流。怪不得劉勰謂：「文辭之有諸譎，譬九流之有小說。」「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文心諸隱）後世東方朔，管輅射覆之辭，亦由此出。同時，隱語在戰國時有它的實用意義，作爲說客及權謀家一種交際手腕³⁰。

隱語和西方的 Riddle 頗相似，很值得搜集，而作比較研究。Riddle 在近東和西歐起源甚早，吠陀及可蘭經中均有之，埃及的 Sphinx Riddle 爲最有名。Archer Taylor 在 *The Literary Riddle before 1600* (1948, California) 書中第二章，列舉世界古代文學性的 Riddle 甚備，可惜未接觸到中國的資料。

II. 「主客」

主客，本爲兵家言，見孫子九地篇。臨沂新出孫臏兵書殘簡篇題有「主客人分」。文心雜文篇：「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主。」又詮賦篇：「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漢志有主客賦篇，此後發展成爲賦在開端的慣例，而且形成雜文一類中對問的新文體。自宋玉設問以後，如東方朔、班固之流，皆沿襲之。漢賦如兩都、兩京，皆以主客開端，都是受到主客方法的影響。

III. 問難

孔門四科，言語列爲第三，儒家以此設教。鄧析的無厚轉辭，「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劉向語）言術有八依、三避。鬼谷子有抵戲篇（漢書杜周傳顏注）。韓非說難，指出十二種談說不同的對象。說客對於「對話」技巧的講求，這是極進步的「修辭術」。希臘人注重雄辯，到 Aristotle（前 384-322）才寫 *Rhetorike* 三卷，成爲這門學問的結晶品，春秋戰國這類材料，如有人整比成書，亦可建立一東方辯辭學的獨立體系（像盧弼著有古詞令學）。

其次談小說的產生問題。

戰國以來，小說的興起原因有如下列：1. 說客喜歡用寓言之故事體；2. 若干民間

故事可用爲談助的資料；3. 長篇故事的誕生，像纏綿悱惻如盛姬之死，見于穆天子傳；博物廣識，像伊尹辨味，事存呂覽。這些最爲膾炙人口。茲將若干先秦小說資料，考述如次：³¹

百家

漢志諸子略收有「百家」139篇。說苑敘錄云：「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別集以爲百家。」則此書似曾經劉向整理，略如說苑的體制。古書所記如：「甘茂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史記甘茂傳）「應侯言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史記范蔡傳）這書諒爲縱橫家所必讀，故主父偃學「縱橫長短之術」，兼及「百家言」（史記主父偃傳）。百家言的佚文，像風俗通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類，「謹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云云（見沈欽韓漢書疏證）。司馬遷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正以其爲小說家言也³²。

伊尹

漢志伊尹27篇，列於小說家。呂覽本味篇記：「有侏氏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令焞人養之，是爲伊尹，尹說湯以主味。」說文引之稱曰伊尹；本味篇即出小說家之伊尹（王應麟說，見漢志考證）。

青史子

大戴禮保傅篇、風俗通祀典均引青史子書說。漢志青史子五十七篇，梁時僅存一卷。劉勰文心云：「青史曲綴于街談。」（諸子篇）街談巷尾的綴錄，這說明青史子正是民間故事的淵藪。

宋子

漢志宋子十八篇，列在小說家。莊子天下篇稱其：「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荀子正論謂：「宋子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是其書當如桓譚所謂：「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顧頡剛曾舉出呂覽中的竊鈇、攫金諸故事，謂即出自宋子，其書能近取譬，有如佛徒之百喻經³³。

汲冢書

瓊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史通六家：「汲冢瓊語記太丁時事，爲夏殷春秋。」隋志著錄四卷，似其書唐代尚存。

穆天子傳

晉書束皙傳：「言周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此本曾經晉人整理，有荀勗和束皙二種本子。今傳荀本六卷，其第六卷即束皙傳雜書十九篇中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³⁴。

其他諸子書與小說多有關係，如晏子春秋，其中故事即是小說的選集。韓非子中的說林及內外儲，（偽）列子的說符，多記民間故事，可說是漢魏雜事小說的濫觴。隋志著錄宋玉子一卷，楚大夫宋玉撰，與燕丹子並列于小說家，則宋玉亦擅長小說，不僅為賦家的巨擘而已³⁵。

（七）戰國時「文學」觀念的演變

戰國時期，由於政治上鬭爭的劇烈，各國君主，網羅人才，有時招集賓客著書，對於文學的提倡，不遺餘力。齊稷下而外，燕昭王築臺于碣石宮，趙有叢臺、野臺（武靈王十七年），楚前期有章華臺，後期有蘭臺，許多文學作品，由是產生。西漢以來，淮南王、梁孝王都是繼承這一老辦法，把文學家集中在一起，觀摩砥礪，因之作者輩出。漢賦的蓬勃，正和此有密切的關係。

可是，戰國有些國家，在法家思想控制下，其施政策略，對於「文學」之事，則深惡痛絕。自秦孝公時商鞅變法以後，整個社會風氣有重大的改變，由于法家思想的抬頭，文學地位遂驟為之降低。三晉地區對於文學的鄙棄，在商鞅、韓非書中，可以見之。黃河流域的文學領導地位，反為江、漢、沅、湘流域的楚人取而代之，非偶然也。齊魯一帶則尚為文學昌盛的地方。史記儒林傳序云：「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法家反文學的理論，像韓非五蠹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取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太史公正引用此語）在「法」的推行下，「文學」必遭受禁止的，因為它是「法」的障礙物。五蠹又云：「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照這樣說來，文學對個人有益，但對國家則極為有害。韓非反對私

學，反對無功之爵。（應即孟子所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爲天爵。」）。在六反篇中說：「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又說：「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他特別反對那些「學道立方」的文學之士，學道則自己有特出的主張，立方則自己有獨立的行動，文學是私便，而非公利，他站在公的立場來反對文學之「私見」、「私說」，所以謂之「亂法」。秦策上說：「文士並飾，諸侯亂惑。……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法家反對文學，是從施政公利上來做出發點。這樣只有跟隨着政治走的文學，文學只是政治的應聲蟲。至是，文學的地位，已被貶抑到了極點。

相反地，儒家、墨家皆倡言文學。論語先進所記孔門四科，第四即是「文學子游、子夏。」漢武班碑云：「數游夏之文學。」唐人正義說指「文章博學」，邢昺疏引范寧云：「善先王典文。」儒家所謂「文學」，是包括前代典章禮文而言的³⁶。荀子非相篇描寫各人的怪相之後，接著說：「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同篇又云：「有聖人之辯者，……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又云：「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楊倞注：「文謂辯說之詞。」這裏的文，是指「辯說」。又大略篇云：「人之于文學，猶玉之於琢磨也。」則以爲文學是不可缺少的教育工具。

墨子亦提出「文學」一詞。墨子非命中云：「凡出言談，由（猶）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按即法儀）；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于員均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這裏的「文學」，是指「立言」的文辭。

文學都爲儒與墨所注重，故漢時任爲「文學」的儒官，他們論學的宗旨，往往兼及儒墨，鹽鐵論相刺篇云：「今文學言治則堯舜，道行則稱孔墨。」是其明證。

文學一名，從春秋戰國至漢，其含義實在經過廣狹多次的變更，略加說明如次：

〔1〕文指「文化」（Culture）的總體，這是「文」的宇宙義。

國語周語下：「單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其行也文，能文則天地……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文之象也。」按此義出自堯典「欽明文思」，注：「經天緯地謂之文。」白虎通三教篇，周教尙文和夏教尙忠，殷教尙敬不同，孔子云：「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可說是極高度的人文觀點。

〔2〕文學指辯說、文辭（Literary work）

如上引墨子、荀子等家說。

〔3〕文學指學術 (Scholarship)

史記儒林傳序云：「延文學儒者數百人……以文學禮義爲官。……自此以來……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漢武舉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即是此類。

〔4〕文學爲官名 (Official name)，指方士或儒生。

秦人薄「文」，此爲商鞅以來之傳統觀念，自無足怪。惟秦時有獄吏典文學者，如史記蒙恬傳：「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典文學。」中井積德曰：「謂作獄辭文書。」秦世教育以吏爲師，此「文學」二字見于秦人史傳，文學且配法律，亦一有趣之事。

秦始皇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諫，以求奇藥。」秦所坑儒生之方術士，亦稱文學諸生。漢代學官及師儒都稱曰文學（見劉寶楠愈愚錄卷五漢學官條，又卷六漢學師條）武威漢簡：「諸文學弟子出穀。」（河平—B. C. 25—一月忌簡）西漢地方郡國「文學」之官，始於景帝末年（見漢書文翁傳），如匡衡爲平原文學。及曹丕爲五官將，亦置文學之官。漢以後，文學往往偏指「經學」（Classics）及禮樂，見崔瑗南陽文學頌。以後才指純文學（belles-lettres）。文學一名，秦漢前後之演變如此。戰國時代，諸子書中所謂文學，大抵是指辯說及文辭而言，涵義不如前後之爲廣義的和偏稱的一樣。

附 註

1. 以後代情形比況之，如揚州畫舫錄所載，鼓子儂曲的唱奏，都在商業性都市集中流行。西曲吳歌之起於荆揚，理有同然，可以推想周地歌詩發達的原因。
2. 水經易水注有荆軻館，又引關駟稱：「荆軻歌，宋如意和之。爲壯聲，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
3. 參金德建秦紀考證。
4. 米芾群玉堂法帖作「咀楚」。
5. 見唐蘭石鼓年代考（故宮院刊 I. 1958）。
6. 參錢穆呂不韋著書考，（先秦諸子繫年）又劉坦 中國歲星紀年。
7. 見李翹屈宋方言考。
8. 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楚聲考，及鈴木修次 楚風の系譜（漢魏詩の研究）。
9. 白狼王所作的遠夷樂德歌，漢人譯義之外，又用漢字記出原來的夷音。丁文江謂白狼語是蠻文；據方國瑜考證，白狼歌八十二字與些音十九相同，不同的只八九字而已，其中有一些是借用漢字的。
10. 莊辛一說，詳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卷四。
11. 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舉出左氏內外傳所載當世的謳謠，和國語晉惠公改葬共世子，國人之誦：有「猗兮

- 逢兮，心之哀兮……」句，先於屈子二百餘年。又史記載優孟歌孫叔敖事用韻方法，亦先於屈子，爲南土之舊音。
12. 近出馬王堆三號墓老子漢初寫本，所有兮字均寫作呵，可證孔廣森詩聲類「猗」「兮」音義相同，猗古讀阿之說，而兮亦音呵。
 13. 鄂君啓節四件，楚懷王六年（B. C. 323）所製，水陸路程的地理，和楚辭「上洞庭而下江」完全一致。此鄂君啓節文和鄂君子皙時楚譯的越人歌，都是楚區域內地方文學極重要的資料。
 14. 錢穆撰下通考，（諸子繫年）。
 15. 從講唱的腔調的辨別而論，楚有楚聲，秦有秦聲。秦聲見李斯諫逐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秦人以伍爲伴奏主要樂器，而歌鳴。而齊聲則舒緩，一般常舉齊風「遙我于紐之間兮」句爲例。如以清代的子弟書唱法爲比喻，子弟書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分。西調緩而低一韻，秦紆良久，東調沈雄壯闊，慷慨激昂。古代齊之聲緩，和燕秦的高腔，想是這樣的情況。
 16. 先秦各地韻文，詳王鳴盛蛾術編七五說集記諸國之風。游國恩先秦文學中春秋戰國時之雜歌詩，不具舉。
 17. 關於成相的考證，可參考朱熹楚辭後語，俞樾諸子平議十五，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胡玉瑄許願述林（成相釋義），方孝岳 屈原和稷下學派（關於屈原天問）趙仲邑成相辭與擊壤歌（國文月刊47）及 N. G. D. Malmqvist 的荀子「成相」釋等篇。
 18. 馬敘倫莊子義證：招借爲招，引說文，招，手呼也。
 19. 參 E. Erkes: Das Zurüchrufen der Seels, Leipzig 1944, Mircer Eliade: Symolismes et Techniques Chamaniques en Chine (Le Chamanisme, p. 349.) 蒙古招魂習慣：詳 C. R. Bawden 著 Calling the Soul: A Mongolian Litany (B. S. O. A. S. Vol. XXV. 1962)
 20. 張懷瑾「招魂」籌縷綿絲民俗證。（國文月刊65期）。
 21. 文崇一 楚文化研究，徵引民族學的材料、緬甸、暹羅等的招魂習慣，茲不備述。
 22. 參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報告）。
 23. 一派知義 挽歌考（京都中國文學報）；邢慶蘭 挽歌的故事（國文月刊61期）。
 24. 參劉永濟 屈賦通箋附錄。
 25. 參 H. Wilhelm: The Scholar's Frustration: Notes on a Type of Fu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 學人之挫折，每以詩、賦言志，申其憤懣之情。
 26. 羅根澤文見諸子考索，又古史辨第四冊。
 27. 徐文見國文月刊67期。
 28. 詳羅振玉松翁近集 p. 33。
 29. 詳李學勤 戰國時代的秦國銅器（文物1957, 8）
 30. 參王煥鑣先秦寓言研究。
 31. 余嘉錫小說家出于稗官說。
 32. 金德建百家書的性質。
 33. 顧頡剛論宋鉞宜入小說家，見史林雜識 p. 33。
 34. 參朱希祖汲冢書考。
 35. 「小說」一名見莊子外物篇，他述任公鈞東海一事，復加以按語云：「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又云：「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末嘗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于世亦遠矣。」這裏任公鈞一故事，正可視作當日「小說」的模型。小說是「談說」之小者；釋名釋言語：「說、述也，宣述人意也。」莊子所指那些幹才諷說之徒，便是「飾小說以干縣令」的人。周制縣比郡爲大。（左昭二十九年）蔡墨言劉累遷于魯縣。楚莊王滅陳爲縣。穀梁五年：「寘內諸侯。」注：「寘、古縣字。」縣是極大的行政單位，所以「干縣令」即干諸侯。莊子所言的小說，分明是指說客干時君所用的一套手法。荀子正名篇云：「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小家珍說當然指那些有乖大道的游說人物，

有如宋鉞一類即是。從任公子一事觀之，這樣的小說是說客的儲寶。諸子書中像韓非有說林上下（即預備作內外儲說的資料），淮南子有說山、說林，列子有說符；所用的「說」字，應該和莊子所言的小說，意義相同。

陸機文賦云：「說煒曄而諷誼。」李善云：「說以感動爲先，故煒曄而諷誼。」諷誼可看作寓言，煒曄可看作卮言；則莊子之書，實亦「說」之一種型態。諷誼即神話（Myth）部份；煒曄是極盡夸飾之能事，非 grand style 不足以當之。莊子之書，可算是「說」之巨觀。至于小說，則取材于其小焉者。桓譚新論云：「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小說」和「小語」、「短書」是同樣性質的。後代以小說爲書名甚多。如殷芸小說有余嘉錫輯本。史通雜說稱：「梁武帝令殷芸編爲小說。」其書實因梁武的通史而作，其資料即通史之外乘。凡不經之碎事，另行輯錄之。小說之所以爲小，于此可見。漢志小說十五家有伊尹二十七篇，而道家別有伊尹五十篇。余嘉錫認爲必出于小說家，非道家之伊尹書。按余說非是。新出馬王堆老子甲本後佚書，附有伊尹論九主一段，且言：「伊尹布圖（即九主圖）陳箝，以明法君、法臣。」與本紀集解引劉向別錄論九主說同。由于是書附于老子之後，可見當是漢志著錄于道家之伊尹書，不必視爲出于小說家。小說與非小說之分，在漢代目錄學家心目中，自有他的界限。

至于小說家的功用，原有它的諷勸意義。隋書經籍志云：「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竟把它和周官誦訓、及訓方氏相比況，且引左傳：「士傳言，庶人謗。」來加以說明，余嘉錫曾有闡述。但看國策齊策記鄒忌因徐公之美一事說齊王，而齊王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者受下賞。這一故事可以看出：（1）利用小說作諷刺的成功；（2）先秦時代確有士傳言，庶人謗的事實。小說的實際功用，在說客口中如果運用技巧非常高明，當然收效甚宏。小說是「諷說之徒」所必備的武器；諷刺（irony）是他的主要技巧。irony 有時是用反語（a speaking by contraries）來引人入勝（irony 源出希臘語之「我問」）。老子所謂「正言若反」，是說話一種特別技巧。近代西方小說愈來愈趨向于 ironic mode，充滿嘲弄（mock）的意味。這種精神在中國先秦已十分發達，尤其是游說之士及滑稽家言流，例如淳于髡「一鳴驚人」的隱語、呂氏春秋重言篇作成公賈諫楚莊王，「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大概春秋以來已流行著的。「小說」是以街談巷語來幫助說明大道理，它的功用是承接這一種教訓精神而來的。可惜這些資料在中國只散見于諸子書中，沒有人正式把它彙集起來，像印度的五卷書（Pancatantra）一樣，整理成爲專書。近人頗討論到中國短篇小說的起源問題。漢書藝文志著錄小說十五家共千三百八十篇，而縱橫家只收十二家百七篇，可見小說數量之富。雖然許多被班志加上不好的評語，如「其語淺薄」、「迂誕依託」等等，但小說家的東西，可能是（縱橫家）說客的糧食，亦可能是史料的剩餘（如周考七十六篇是「考周事也」）。小說的內涵也包括了神話、傳說、史事、寓言，尤其小說在干縣令時每還用 ironic 的技巧，來說服人。它表現的方式花樣，和今天所謂小說的體裁雖不相同，可是本質上是沒有二致的。

36. 陳槃曰：『案孔子之所謂「文學」，竊以爲當以全部經藝爲主體；而典章之類，則是其次。「文學」簡稱則曰「文」。論語學而：「行有餘力，則爲學文」。正義：「（馬融）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六經是也」。不誤也。齊魯間之所謂「文學」亦然，故史記儒林傳上言「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繼即云：「故漢興，然後諸儒得修其經藝」；漢書地理志下齊地條亦云：「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齊魯之文學既無異於孔子之所謂文學，則與戰國時期燕趙楚國所提倡所影響而產生之純文學，似不可以相提並論』（若稷下學士『談天』、『雕龍』之輩，則又當別論）。

引用書目

楊寬，戰國史

陳夢家，六國紀年

呂思勉，先秦史

朱希祖，汲冢書考

徐 復，秦會要（訂補）

蒙文通，古史甄微

金德建，秦紀考證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 1959, 7, 8, 9 三期）

王國維，兩周金文韻讀

郭沫若，兩周金文韻讀補遺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

唐 蘭，石鼓年代考（故宮博物院院刊 1）

劉知幾，史通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下，又文集篇

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又秦獻記

游國恩，先秦文學

聞一多，詩與歌

朱自清，中國歌謠

龍宇純，先秦散文中的韻文（崇基學報 2，3 卷）

余嘉錫，小說出於稗官說

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宋鉅書入小說家

王煥鑣，先秦寓言研究

王利器，文心雕龍新書

中島千秋，賦之成立と展開

鈴木修次，漢魏詩の研究

星川清孝，楚辭の研究

Burton Watso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1962, New York

E. Erkes, *Das Zurüchrufen der seels*, Leipzig, 1944

N. G. D. Malmqvist, *A note on the cherng-shiang in the shyum Tzyy*

（論荀子成相）